

成都龙泉区北周文王碑再调查

雷玉华

(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北周文王碑刻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大佛村八组大佛寺后的天落石上。近三十年来, 学者们对于碑的性质、年代, 碑旁 34 号龕与碑的关系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有不同的观点。笔者经过仔细观察, 从考古学叠压打破关系入手, 结合龕像特征, 认为现存第 34 号龕为文献上所记录的北周强独乐等为北周文王所造像佛道二尊像, 但龕内像在北周武帝灭佛时可能就遭到了破坏, 经过后代改刻、增补形成了现状。同意部分学者认为的现存碑刻是根据《周文王庙碑》和《后周宇文泰纪功碑》残碑拓本经续补之后的重刻。

关键词: 北周文王碑 周文王唐碑 后周宇文泰纪功碑

中图分类号: K8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0) 02-0037-11

一、北周文王碑概况

北周文王碑刻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大佛村八组大佛寺后的天落石上。大佛寺又名石佛寺, 所在地为成都至重庆的古道靠近龙泉山顶路段柳沟铺。天落石现为半山坡耕地里一块孤零零的大石, 大石东壁及北壁东端刻满了造像, 龕与碑共编 54 个号, 碑为第 38 号 (图 1)。1961 年被列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 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碑与第 34 号龕位于东壁正中 (图 2), 碑右^①侧的第 34 号龕是崖壁上最大龕, 也位于崖壁中间最佳位置, 龕内现为佛道合龕造像。现存北周文王碑为半圆形螭首, 龟座, 方形碑身, 通高 2.44 米, 宽 1.24 米。碑额阳文, 竖刻 15 行, 行 4 字, 计 56 字, 均刻于

收稿日期: 2020-0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川渝地区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保护性设施的考古学调查与研究” (19XKG006); 西南民族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科研资助金资助项目 (YJ20180501)

作者简介: 雷玉华 (1966-), 女, 重庆涪陵人。教授, 主要从事四川石窟考古研究。

① 文中左右均以崖壁上像之左右为准。

方格内，叙述刻碑人、刻碑原因及时间^①。正文阴刻于较小的方格内，竖读40行，行34格，计1348字，叙述北周宇文泰的功绩。南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中已有记载，之后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清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均有著录^②，《成都文物》1987年第3期有成都市龙泉区文管所薛登录文并标点^③。



图1 北周文王碑现状



图2 34号龕现状

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对于碑的性质、年代，碑旁34号龕与碑的关系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不同的观点。笔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因多次陪同参与研究讨论的诸先生上山考察，产生了一些疑问，2014年冬再次前往，经过仔细观察，我认为学者们争论的问题有了答案。

二、关于北周文王碑的争论

《文物》1986年第3期刊载了丁明夷先生《从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看北朝道教造像》，文章开头便说“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原石已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曹琦同志有旧藏拓本”，这引起了四川文物工作者的关注，随即围绕北周

-
- ① 碑身上方刻：“此周文王/之碑。/大周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军都县/开国伯强/独乐为文/王建立佛/道二尊像，/树其碑。/元年岁次/丁丑造。”是为碑名及刻造时间的由来。
- ② [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4《简州碑记》，其记有：“周文王庙碑，在阳安县西北，上十五里即后周高祖文帝之庙。旧碑题额云：‘大周植其碑，元年岁次丁丑造。’元年即后周闵帝之初元也。今石刻存焉”。《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24页。后面还有“后周宇文泰纪功碑，碑在本州界。首云：泰数遣都督入蜀，一治石岗县，一治怀远县。见《简池志》”。这里说明原碑有两块，一块是“周文王庙碑”，一块是“后周宇文泰纪功碑”。清人刘喜海《金石苑》始录今北周文王碑之全文。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清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楷法溯源》以及康有为《广艺舟双辑》均有著录。
- ③ 薛登《〈文王碑〉录文标点》，《成都文物》1987年第3期，第30-31页。

文王碑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工作成果发表于《成都文物》1987年第3期^①，同时《文物》1987年第8期刊载了参与工作的成都市龙泉驿区文物管理所薛登先生的文章《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未佚》。从此，北周文王碑重新为学界关注，三十余年来，争论不断。相关争论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集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主要观点有：丁明夷先生主要是据碑文对四川的道教造像及北周史实进行了论述，并认为碑文下方线刻小佛像为强独乐等刻碑时所造“佛道二尊像”。赵纯义、王稼佑二先生等则认为碑旁处于岩石正中位置的最大造像龕，即现编号的第34号龕与碑文所记北周造像无关；同时认为，碑上两身线刻佛像晚于碑文；现存于天落石前的佛寺（今大佛寺）原是强独乐为北周文王所修祠庙，庙前立了“北周文王庙碑”，又在庙后天落石上刻了一通纪功碑；还认为，现存碑额上的文字经过改刻，改刻时间在隋代以后到唐代大历年间，34号龕是唐代作品^②。薛登《北周文王碑及造像问题探新》主要否认了丁明夷生对碑及碑上线刻佛像的认识，认为北周强独乐所造碑碑额上原无字，现存碑额文字及碑旁34号龕为唐人李去泰所刻^③。刘节《北周强独乐为文王造佛道二像碑记跋》则认为，宋代王象之所记蔺融撰《北周文王庙碑》今无存，现存的碑是另一块碑，即王象之所记的纪功碑^④。

第二阶段，从21世纪开始至今。首先是荣远大、刘雨茂、薛登等再次撰文，对碑之真假及相关遗迹进行讨论^⑤。荣远大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对碑文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从天落石上唐代大历年间刻《资州刺史叱干公三教道场文》、北宋诗人宋京题诗等内容及时间上看，石佛寺古称周文王神祠或周文王庙，也就是碑文中所称的“为文王敬造佛道二尊宝堂”之宝堂；同时指出碑的形制与内容有矛盾，现存碑不是强独乐等人所立《周文王庙碑》的原碑，而是宋人根据《周文王庙碑》和《后周宇文泰纪功碑》残碑拓本经续补之后的重刻^⑥。胡开全^⑦在荣远大的基础上对碑文进行了考释与解读，认为，北周文王碑虽然不是原碑，但其历史价值仍然非常高，这在1986年和1999年两次考古研究中已经从考古专业的角度加以确认。温玉成等《成都龙泉驿北周

① 《成都文物》1987年第3期刊布了赵纯义、王家祐《北周文王碑考查报告》、成都市文管会办公室等《石佛寺石刻简目》、薛登《北周文王碑及造像问题探新》《〈文王碑〉录文标点》、刘节《北周强独乐为文王造佛道二像碑记跋》。《文物》1987年第8期刊载了成都市龙泉驿区文物管理所薛登《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未佚》。

② 赵纯义、王家祐《北周文王碑考查报告》，《成都文物》1987年第3期，第1-7页。

③ 薛登《北周文王碑及造像问题探新》，《成都文物》1987年第3期，第21-25页。

④ 刘节《北周强独乐为文王造佛道二像碑记跋》，《成都文物》1987年第3期，第26-29页。

⑤ 荣远大、刘雨茂《北周文王碑真伪考》，《成都文物》2000年第1期；薛登《〈北周文王碑〉及相关遗迹辩证》，《成都文物》2003年第3期。

⑥ 荣远大《关于北周文王碑的几个问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考古研究》（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03-510页。

⑦ 胡开全《北周文王碑考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国学》集刊第二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7-167页。

强独乐造像考察记》^①，同意荣远大关于现存碑为两碑“合二为一”的说法，但不同意四川学者对碑旁最大龕佛道造像是晚唐五代开凿的看法；从龕下二狮、龕内护法、造像组合、风格形式等方面考察，认为34号龕正是北周文王碑中提到的“强独乐为文王造像”，并将造像时间确定在公元557年元月，宇文觉建大周，追封宇文泰为文王，至九月宇文觉被弑之间，认为这是成都地区最早的摩崖造像，也是全国最早的北周造像。

三、相关问题之我见

目前实地考察过的学者大多认为现存北周文王碑经过改刻，这是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什么时候改刻的？改刻了哪些部分？现存于碑旁的第34号佛道合龕造像的年代、与碑的关系等问题是争论的焦点。本人经过多年的观察，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以上问题：



图3 天落石上的五代造像龕，左侧着袈裟菩萨与34号龕内补刻菩萨像极相似

1. 碑及34号龕周围造像的年代问题

本人曾就四川石窟寺和摩崖造像进行过广泛调查，并做过四川石窟寺分区与分期研究^②，根据与四川其它地区考古材料对比，结合现存造像的龕形、造像风格、造像组合、造像题材、所存铭文等观察，除34号龕外，天落石上现存造像多为佛教造像，都是开凿于唐代后半段至五代，甚至有更晚者，但不会晚于宋代以后（图3）。大部分可能是在天落石前面大佛寺内的石壁上唐代开凿了大佛之后的大历年间及其以后开凿。但是，崖壁上其实有众多打破关系：

比如，从立面上很容易看出来，编号23的圆拱形龕实际上是由多个有打破关系的小龕组成（图4），从23号龕上方可以看到它是将一个有桃形龕楣的小龕扩大而来的，原来小龕的桃形素面龕楣还清晰可见。而龕左侧现存龕内造一尊观音立像的22号小龕又打破了现在的23号圆拱形龕的龕边。现在看到的23号龕，为圆拱形单层龕，无龕楣，龕内上方有一尊坐佛像，应该是原来的主尊，主尊两侧从空间位置及现存残像看，应该有二弟子二菩萨胁侍，但现在只能看到残存的二尊立像的下部，一尊着僧装，一尊似为菩萨装。因此可以确知原来为一佛二僧二菩萨五尊组合。圆拱龕下部中间被一个横长方形的龕破坏，横长

① 温玉成等《成都龙泉驿北周强独乐造像考察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24-330页。

② 雷玉华《四川石窟分区与分期初论》，《南方民族考古》第10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93-219页。

方形龕中并排坐四尊佛像。右下方四尊坐佛龕的右侧另有一尊佛像坐于束腰高座上，高座中间束腰部分呈长方体状，这是唐代高宗、武周时期洛阳龙门出现的新样式。而这尊佛像似与左侧横长方形小龕中的四尊佛像无关：从打破关系看，它早于左侧四尊佛像，与龕上方那组像的关系不明确；从体量看，它比上方那尊主像坐佛稍大，因此，可能二者也有早晚关系，只是现存痕迹看不出来了。23号圆拱龕下部横长方形龕内的四尊佛像袈裟前面的褶纹与邛崃盘陀寺1号龕唐代大历年间开凿的大佛极相似，这种褶纹在四川一直到五代也流行，如蒲江飞仙阁五代明德年间三佛造像与此很相似。



图4 天落石上打破关系复杂的23号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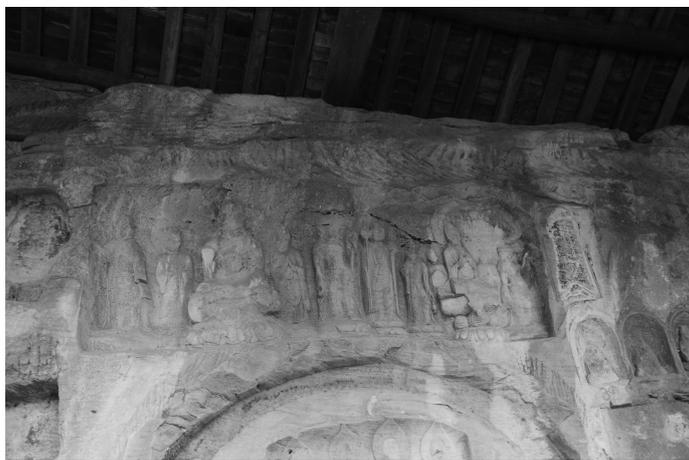


图5 37号龕的组成

又如，现在看到的第37号龕，也是由四个有打破关系的龕组成的（图5）；左侧一组像可以看出原来位于一个小龕中，主尊阿弥陀佛，胁侍二弟子及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像；右侧一组像原来也位于一个小龕中，龕中主尊为释迦佛，两侧胁侍二弟子二菩萨像，但其左侧菩萨像身后后来又开凿了一个小型竖长方形龕，这尊菩萨像就成了单独在这个龕中，在这尊菩萨像左侧再后来又开了一个竖长方形小龕，龕内造药师佛立像一

尊，药师佛小龕打破了右侧的菩萨小龕和左侧阿弥陀佛龕，而阿弥陀佛龕有造像题记，37号龕左侧的唐代大历五年（770年）造像碑就是这龕阿弥陀佛的造像题记^①。这就是为什么第37号龕内现在看起来就有11尊像，中间是一菩萨一佛立像，似为主像，但又比较别扭，两侧各为一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组合，右侧造像组合中又少了一尊菩萨像；而且各尊像的时代风格又不相同，看起来比较杂乱，最晚开凿的那尊药师佛像有晚唐五代至北宋初的风格。

这些打破早期龕的造像多有五代、宋初的特征。从37号龕的情况看，被打破的造像龕多为唐代大历年间及其以后作品。所以最初调查者们认为天落石上造像多系晚唐五代、甚至宋代，^②而早期研究者们又多将之定为晚唐五代^③。

现存23号龕上部所存另一个龕的龕楣说明它打破的小龕有素面桃形龕楣，位于34号龕旁边。34号龕也是有素面桃形龕楣的。这种浅刻出素面桃形龕楣的小龕在四川现存的摩崖龕中有潼南大佛寺旁边隋代的道教造像、剑阁横梁子贞观的小龕等，它们是隋至唐初四川流行的龕形，北周虽然四川没发现纪年摩崖造像，无法对比，但仍在这一时间范围内。34号龕上方现存的一些小龕仍然可以看到有这种龕楣。从造像风格看，下部打破了现存23号龕的四佛袈裟样式、造像风格与邛崃盘陀寺1号龕大历年间的大佛等如出一辙，可以推定其开凿于唐代中期后期。这些现象说明：

（1）23号龕打破了一个与34号龕有同样龕楣的小龕，这种龕楣在初唐及以前就已流行。（2）虽然目前这里看到的龕像大都开凿于唐代大历年间及其之后，但是天落石上在唐代大历年间以前早已有龕像，34号龕与其左侧被23号龕破坏后仅存桃形龕楣的龕是最早的一批造像，它们开凿时代接近。

2. 34号龕的年代问题

温玉成先生等《成都龙泉驿北周强独乐造像考察记》^④中认为第34号龕与碑是天落石上最好的位置，也就是说可能是最早被选择作为造像的位置，并认为二者是一同开凿，34号龕中的佛道二尊像就是强独乐为周文王所造佛道二尊像。这一点本人非常赞同。不同的是，温老师从34号龕中造像的风格、组合、护法力士的形象等方面认定此龕是北周造像。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实34号龕中的造像是经过改刻的。在与去过现场的诸位学者口头讨论中，首先争论比较大的，也是最初调查者将这龕定为唐末五代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龕中右侧主尊道教造像两侧的女侍者像，此二像长发挽成双髻贴在双耳两侧，发髻长而大，捆扎的发卡或头绳位置在发髻中间紧贴耳旁（图6）。这种头挽双髻的发式流行时间很长，唐宋时期很常见。但现在所见，相对而言唐代的这种发

① 该题记为：“□南府开国男/守左骁卫/大将□□/少府监/赐紫金鱼/袋羊贵敬造阿弥陀佛一铺/□□□及先考□□平安永为供养。”成都市文管会办公室等《石佛寺石刻简目》，《成都文物》1987年3期，第13页。

② 成都市文管会办公室等《石佛寺石刻简目》，《成都文物》1987年3期，第8-20页。

③ 例如：薛登《〈北周文王碑〉及相关遗迹辩证》、荣远大《关于北周文王碑的几个问题》。

④ 温玉成等《成都龙泉驿北周强独乐造像考察记》，第324-330页。

式双髻圆而短，且捆扎的发卡或头绳位置偏高，例如巴中水宁寺唐代中期的2号龕左壁女侍像。即便是有发髻比较长的，其髻捆扎的位置比较高，而且上下两半发髻大小不同，如西安出土的一尊唐代女侍像（图7）。天落石34号龕内这尊像的双髻长而低，捆扎位置上下两半节长度几乎相同，两半节各呈长长的椭圆形，几乎贴在耳后。这种长而低的双髻在四川现存石刻中，多见于五代、宋，甚至更晚，例如，绵阳北山院宋代地藏十王龕中的多尊侍女像都是这种发髻，有的呈圆形，髻较高，有的已贴近耳后，与天落石这两尊女侍像相似。加上此龕周围现在所见造像多为唐代大历年间及以后的唐代中晚期雕凿，因此许多学者将这龕像定在了晚唐五代。



图6 34号龕内中间及右侧像



图7 1987年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出土挽双髻的唐代女像

34号龕左侧主尊面象风化不清，袈裟一角搭在左肩前并有钩钮固定，在成都南梁晚期的大型佛像中，可以看到汉式袈裟搭在左肘或左肩膀后的一角上有一颗钮扣或盘结的穗饰，并没有雕刻出其使用的状态，例如川博21838号坐佛像^①。而象34号龕这样雕刻出钮扣或钩钮使用状态的造像目前笔者所见最早的是山东北齐造像，但是在四川地区大量流行则是已到了唐代后期至今，这是最初调查者将这龕造像定为晚唐五代的原因之二。仔细观察，左侧主尊左手臂、左侧钩钮固定的袈裟一角，刻线与下摆相比，衣褶大而粗糙，而且似向内凹进了许多。右手肘部衣褶也与衣摆表现方式、深浅不一致，褶纹显得宽、深、且粗糙，似乎原来右手是举胸前，被改成了现在的斜向左上方贴胸前（已残），并且由于壁面不够高，比较明显向内斜，使得整尊像这个位置内斜，不够饱满，向内斜的位置还隐约看出形成了一道棱（图8）。总之，这尊像肩膀以下至双肘间的位置是经过改刻所至，使这个位置袈裟褶纹呈现出晚唐、五代的特征。

^① 四川博物院等《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图17，第54-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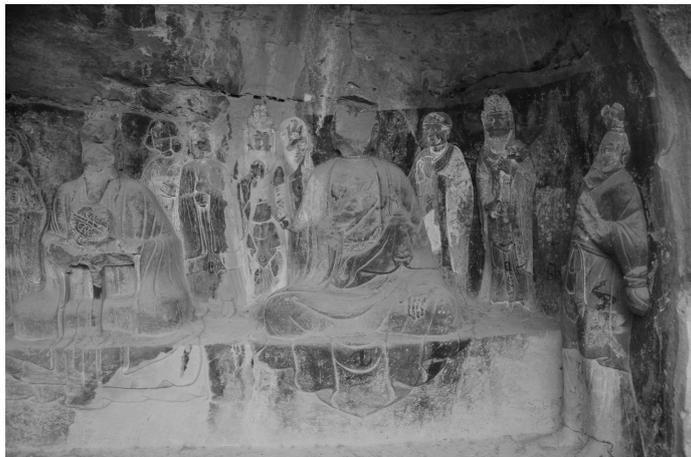


图8 34号龕左侧主尊及胁侍

从造像风格、姿态、衣冠等特征看，龕下方二狮、香炉及托香炉的力士、龕口二力士均是北周时期造像特征，只是右侧力士身后右侧似晚期向内稍稍挖进，使现在身体右后侧壁面呈显内凹，力士右侧衣袖、后背可能受到影响，姿势略呈不自然状态。龕内二主尊两侧的胁侍像则有些不协调：首先，从空间布置上看，如果只看二主尊与龕口二护法力士像并龕前二狮及香炉，空间非常舒服，而且四尊像之间的间距是均匀且对称的，四尊像都突出于崖壁，是接近圆雕的高浮雕造像，总体而言是北周造像中比较漂亮的布局。而二主尊分别胁侍的四尊像身体平面都低于上述四尊像，身体平面高度没有起伏，全部统一在一个平面，这说明雕刻之前没有在崖面上预留出像坯，也就是没有计划。除了像显得比较平面外，也很拥挤，特别是二主尊之间的中间四尊像，很象硬挤进去的感觉。在四川隋唐时期类似的佛道合龕造像中，中间空间如果不够，中间位置通常会二者共用一尊护法，或某位主尊少一身胁侍来解决，而这龕像没有这解决。再看左侧天尊像胁侍的二女侍、二真人造像，除了身体平面低平、没有象预先留出像坯的造像那样不同部位有高低起伏外，衣褶线条与四川晚唐至宋代的造像极相似，特别是天尊旁边的女侍像，线条几乎没有起伏，就像平面线刻。（宋代四川地区摩崖上颇流行线刻像，只是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如安岳净慧崖宋刻赵处士像、安岳卧佛院第79与80号龕之间崖面上的线刻像等。）左侧主尊前的二僧像身体也是平面的，二菩萨袈裟披裹方式、胸腹前褶纹，与川西、及川东安岳一带的五代造像极相似。另外，四川菩萨着通肩袈裟五代以前不多见，而在安岳地区五代造像中比较多见（图3）。

因此，不妨推测：正如温老师所言，34号龕正是强独乐为北周文王所造像。但后来经过了改刻，它原来的组合可能只有二主尊、二力士、二狮及香炉。或者环绕二主尊有浅浮雕的护法，但是后来增加了二僧二菩萨、二女侍、二真人，形成了现在的组合。而且，左侧主尊胸以下、双肘及肘以上经过了改刻。这些改刻、补刻使整龕呈现出五代、宋的特征，而原本就有的二力士又是北周造像，导致了长期以来对造像风格、年代

的争论。因为龕内有向后壁深挖、改刻、补刻造像，为保持龕壁平整，龕内空间、尤其是上半部分有所扩大，导致了34号龕的桃形龕楣底部被破坏，仅存很少一部分，因此，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个桃形龕楣，而这种龕楣是四川南朝之后至唐代前半期常见的龕形特征^①。

3. 碑上四佛小龕、线刻二佛与碑的年代

先从碑首来观察现存北周文王碑，现存碑首低于碑身平面，而碑首上阳刻的螭龙平面似与现存碑下半部分边栏在同一高度，也就是说阳刻图案最高的位置是原碑可能的平面。现存碑首、碑身平面低于边栏，这些都不是常见刻碑的方式，常见的任何时代的碑，碑身部分一般不会低于边栏，碑身刻字的位置不会凹进去，碑首部分平面一般会高于碑身或者同高。目前所见这种现像应该是磨去前人雕刻所致。

其次，碑首上有一个方形小龕，龕内并列坐四尊小佛像，所有讨论中没有提及这个小龕。仔细观察，可以看到这个小龕实际上打破了碑额，龕边比较粗糙，与雕刻、打磨很好，并将文字刻写在规整、讲究的方格内的碑额表现出极不一致的雕刻态度。小龕边破坏了碑额上的螭龙爪和装饰莲花。小龕内佛像与四川其它地方同类造像相比较，不会早于唐代。若从壁面选择的角度考虑，应该是没有更好的位置了才会去破坏已有的雕刻，因此它还应该晚于碑及龕侧的大历年间的诸龕（图9、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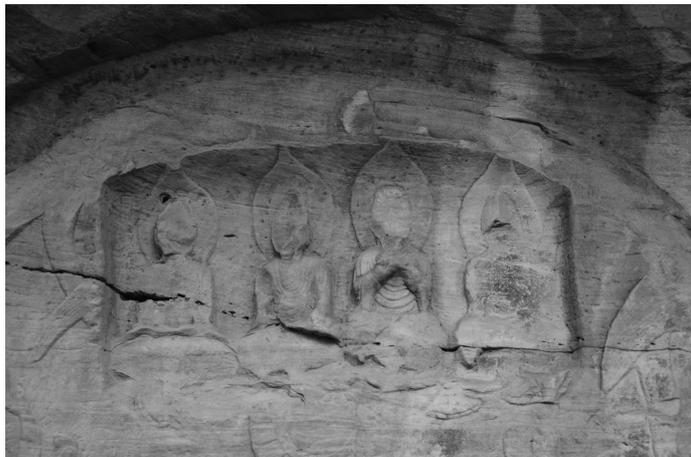


图9 四佛龕破坏了原来的碑首装饰

^① 王剑平、雷玉华《6世纪末7世纪初的四川造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图 10 碑首、碑额、碑身平面关系

现存大历年间的造像，经学者们确认的都集中在 34 号龕附近，天落石前面现存于大佛寺内的弥勒大佛也雕刻于大历年间，碑身上的两尊线刻小佛像，也是唐代补刻。本人同意这一认识。再看碑上铭文，碑文题名：

此周文王之碑。/大周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军都县/开国伯强/独乐为文/王建立佛/道二尊像，/树其碑。/元年岁次/丁丑造。

行文开头即称“此周文王之碑”，明显后人口气，而且碑的题名长达 50 多字，这些均不符合碑额题写习惯。其次，现存碑额文字所在位置明显下凹，与碑身、碑首的高度不在一个平面上，有明显后代下凿痕迹，薛登等早期调查的学者均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因此，我同意碑额文字系后来改刻的意见。再看碑身铭文，薛登、荣远大等早期学者都注意到了碑额与现存碑文内容的刻字不匹配，碑额平面低于碑身铭文平面，且在同一边栏内又挖出一方框，再于新挖出的方框内刻出棋盘状方格并刻碑额，似为打破了碑身铭文所在平面形成。因此，现存碑上的铭文系两次刻成。碑下方二尊小佛像正如赵纯义、王家祐二先生所观察，晚于碑上现存铭文，最好的证据就是左侧像圆形背光压在碑身下沿的朱丝格上^①。至于碑身文字内容，荣远大、刘节、薛登等意见比较一致，认为系后代人将周文王造像碑与周文王庙碑内容合二为一后补刻，本人也同意这一看法。

4. 推论

基于以上观察，我认为可以这样设想：天落石上强独乐等人于 557 年元月至 9 月之间的某时在这里为周文王雕造了佛道二尊像，即今之第 34 号龕，并刻碑，即今存之 38 号碑，但碑铭已被后人磨平。第 34 号龕旁边又有同期或稍晚别的人开龕造像，即今 23 号龕破坏掉的有桃形龕楣的小龕。后来有人将碑首下挖，减地刻出了现在看到的螭龙、

^① 赵纯义、王家祐《北周文王碑考查报告》，第 4 页。

鸟、莲花（只存局部），可能是同时，或者不同时间，碑身下挖，留出高于碑平面的边栏，又在碑身上边栏内下挖出的平面上刻出现在看到的碑文，但碑文系两个碑的内容拼成，而且现在看到碑身上的文字似乎前面十几行字要密一些，后面的字要疏一些，整个碑身上的铭文刻于浅刻朱丝格内，但刻得并不十分规整。后来又在碑身文字上方挖出一块长方形平面（也许原来有文字或别的内容，所以需要下挖，以彻底清楚原来的痕迹），并刻出棋盘方格，方格内刻现在看到的长达 56 字的碑额，这次碑额刻写非常漂亮，也很认真，与方格划得不太好的碑身文字不太匹配。也许在这时或稍晚、稍早，线刻了下方的两尊小佛像。到五代前后，碑首上又开凿了四佛小龕，这个小龕打破了碑首上第二次增刻的螭龙的爪及中间的莲花。34 号龕也在五代前后（下限或更晚）被改刻成现在的样子，主要是龕内上部空间有所扩大，导致了原来的桃形龕楣受损，又增加了二主尊两侧的胁侍、左侧主尊肩以下至肘部分被改造过了。

在改造碑及 34 号龕的年代，天落石上不停有造像，它们有的打破了原来的龕像，比如 37 号龕中间的药师佛就破坏了大历年间的阿弥陀佛像龕。

碑与像最初的破坏很可能源于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本人曾撰文论述成都的北周造像时言及了东西魏分裂后及代替它们的北周、北齐的政治取向，以及东魏、西魏两个政权对待佛教截然不同的态度^①，认为，西魏、北周统治者一心为统一大业，在他们的统治下佛教不大可能有大发展。事实上，周武帝建德三年（574）五月下诏灭佛，同样灭了道：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可见其志向并非只为灭佛。而东魏、北齐的统治者则继承了北魏佞佛的传统，佛教与开窟造像才在短时间内获得了空前的繁荣。继北周而起的隋代统治者也是佞佛的，因此，北周文王碑及其造像，特别是造像，最初的毁坏可能是遭遇了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也就是说雕造十余年后即可能被毁坏了。以致才有后来主像、左侧力士身后的改刻痕迹。34 号龕像的改刻、补刻可能与现在所见碑额的题写时间相同。

^① 雷玉华《成都南北朝佛教造像再观察》，《南方民族考古》第 16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21-153 页。